

○肖枫文选

世界社会主义

◆ 肖枫 著

热点·焦点·难点

当代世界出版社

○肖枫文选

世界社会主义 热点·焦点·难点

肖枫 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社会主义：热点·焦点·难点 / 肖枫著.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2016. 5

ISBN 978 - 7 - 5090 - 1094 - 5

I. ①世… II. ①肖… III. ①社会主义—世界—文集
IV. ①D50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81204 号

书 名：世界社会主义 热点·焦点·难点

作 者：肖枫

责任编辑：王泽军

出版发行：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复兴路 4 号 (100860)

网 址：<http://www.worldpress.org.cn>

编务电话：(010) 83907528

发行电话：(010) 83908409

(010) 83908455

(010) 83908377

(010) 83908423 (邮购)

(010) 83908410 (传真)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16

印 张：47.25

字 数：680 千字

版 次：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5 月第 1 次

书 号：ISBN978 - 7 - 5090 - 1094 - 5

定 价：5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2014



1954



2004

作者简历

湖南新宁学生仔	志愿参军离开家
考入人大读马列	工作涉及普天下
平生机遇多诱惑	唯有求索一不二
前沿风口浪淘沙	留得拙著任洗刷



左：《开放的世界》，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年，沈阳
 中：《西方发展学和拉美的发展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年，北京
 右：《当代拉丁美洲政治思潮》（主编），东方出版社，1988 年，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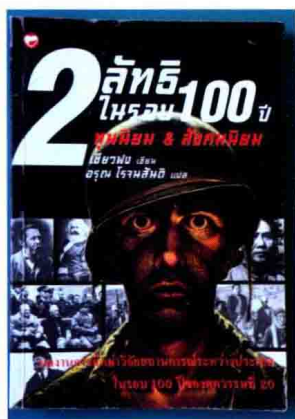


左：国家“九五”规划重点项目，由李淑铮、龚育之、高放、赵曜任顾问，肖枫任主编，中联部秘书长朱达成等 50 多人参与撰写工作。时任中联部部长戴秉国作序。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 年，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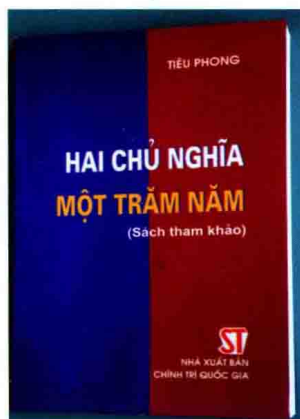
右：泰国曼谷的健心出版社于 2000 年 3 月从《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中，摘取“总论”部分译成泰文，作为单行本出版发行，取名《社会主义过去现在和未来》，署名作者为高放和肖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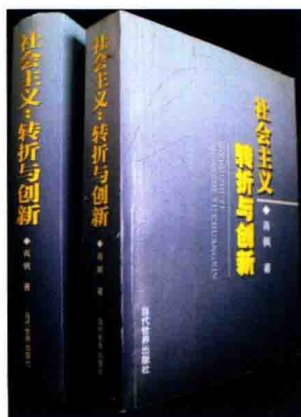
《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个主义一百年》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 年，北京。2002 年获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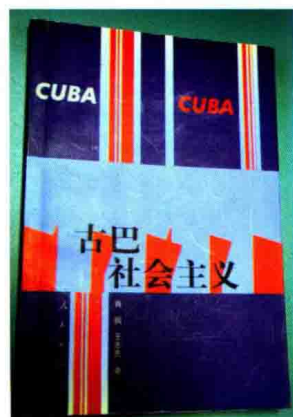
《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个主义一百年》泰文版，泰国健心出版社，2003 年，曼谷



《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个主义一百年》越文版，越南国家政治出版社，2004 年第 1 版，河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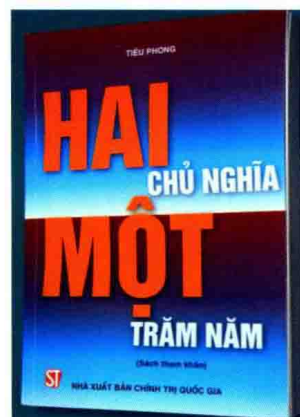
《社会主义：转折与创新》，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 年，北京



《古巴社会主义》（与王志先合著），人民出版社，2004 年，北京



《苏联解体我的解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 年，北京



《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个主义一百年》越文版，越南国家政治出版社，2015 年第 2 版，河内



1998年冬季的一个周末，时任中联部部长的戴秉国冒雪赴顺义看望正在那里赶任务的研究室同志。前排自左至右为：姜述贤、肖枫、戴秉国、裴援平、张志军



1999年与中国著名学者赵曜、高放教授（自左至右）在温州参加全国性学术研讨会



2000 年与俄罗斯学者斯拉文及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李兴耕教授在武汉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4 年与奚广庆教授（左二）、王建民教授（左一）和赵曜教授及夫人在济南参加学术会议



1998 年与学术界朋友在上海参加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 150 周年理论研讨会。
自左至右为：周尚文、胡文建、顾锦屏、肖枫、李敬德



1988 年作者由拉美局调往研究室，此为当年研究室同志合影，第二排右一为作者



1998 年作者退休后接受返聘，与同事们议事。自左至右：姜述贤、柴尚金、肖枫、袁智兵、沈强



作者退休生活一瞥：十多年前的一个镜头。现在孙子上大学了，再也没这么乖啦！

前 言

这个文选性的集子，大部分是在报刊上分散发表过的文章，当然也包括部分未公开发表过的内部文稿。每篇文章都是独立成篇的，彼此间没有逻辑关系。然而它们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特征，这就是所有文章几乎都是不同时期人们所关心的、有争议的热点难点问题，有的甚至至今还在争议之中。而这些问题大都属于世界社会主义领域的问题，这就是这个集子如此取名的一个重要缘由。要将这批文章编入一个集子，不得不将它们适当归类，于是全书按问题分成了九类，外加一个“附录”，共计十部分。同一类别的文章之间，按问题相近或相似进行排列。至于文章发表的时间和地点，不是在文章开头的“题注”中做了交代，就是在文后的单独加注中做了说明。

奉献在读者面前的这十部分，如果再简化一下，可归为三类，分别起不同的作用：一是“热点回眸探究”，二是“揭秘中联部”，三是“借花献佛”。为什

么这么讲呢？

首先，从“时代·战略·形势·政策”到“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为止，是这个集子的主体。这是从近二十多年来在报刊上分散发表的文章中筛选出来的有关社会主义的热点、焦点和难点问题。现在将它们汇集到一起，可起“热点回眸探究”的作用，即：既可集中起来回眸研究，又可进一步探究这些问题未来发展的趋势。譬如：

——如何认识当今的时代，几十年来是有不同的看法和争论的。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论断，扭转了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老观念，使全党能集中精力搞建设。90年代针对苏东剧变后兴起的“社会主义消亡论”，邓小平又指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总趋势不可逆转”，坚定了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立场和决心。前者实际说的是“时代主题”，后者实际指的是“时代本质”。将这两方面结合和统一起来，对当今时代的认识就全面而完整了，即：时代主题转换了但时代本质没有变，仍然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尽管邓小平的这些论述很明确，然而关于时代问题的争论至今仍未停息。

——什么是发展，要什么样的发展，以及如何发展，已成重要的热门话题。现在我们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五大发展理念来引领中国发展的，然而20多年前我们对“发展”的认识、对“要什么样的发展”，在观念上还是很粗浅、不全面的。

当年作者从“发展学”和“可持续发展”角度写文章，阐述这些概念的来龙去脉，提出要加强宣传力度，强调实施可持续发展的紧迫性、特殊性和综合配套性等建议，虽然粗浅但却是及时和积极的。此外，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中国应怎么办，也是有争议的话题。中国要不要加入WTO，要不要融入国际经济大潮？当年有不同主张。作者在众说纷纭中明确发出过自己的声音。再者，社会主义国家在长期建设实践中的主要教训是什么，作者曾发文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教训，不在这个或那个具体问题上，而在于总的指导思想上。这就是：低估了资本主义，高估了社会主义，看近了共产主义，忽视了封建主义，从而扭曲僵化了马克思主义。因此可以说，是教条主义、封建主义的特殊结合严重损害阻碍了社会主义的发展。

——苏联东欧发生“政治地震”，特别是苏联这个超级大国崩溃解体以来，有关研究其原因教训的著作浩如烟海，多如牛毛。关于剧变崩溃的原因，有众多的这种那种“说”。它们都有一定道理，但任何一“说”再怎么重要也不可能成“唯一”的，必须从“整体”上去把握。因此必须重视“合力论”与“重点论”相统一。作者认为，苏共是长期的“左”发展到后期的右。苏共演变具有“长期性”，但整体质变具有“快捷性”，垮起来快得很。吸取苏共的教训，就整体而言，既不能走邪路，也不能走老路，而要走新路。对马克思主义既要坚持又必须发展。此外，对如何正确评价斯大林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的

关系，以及国际共运中一系列历史事件，包括“大论战”、“九评”、“一论”和“再论”等，这个集子均有文章涉及。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有什么新变化？两个主义间仍是“不共戴天、你死我活”的关系，还是变得“弹性化”和“多样化”了呢？如何看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两个主义”之间是否可以在相互作用、斗争和较量中彼此互相借鉴、学习和吸收对方有用的东西，从而取得“取长补短、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实际效果呢？对这些问题也长期存在不同看法，是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

——为什么不能赞成“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论调？对“民主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顶礼膜拜、照抄照搬？应如何正确地看待和对待“民主社会主义”？如何看待“国际主义”？党章为什么删除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提法？近年有人强调搞国际联合，提出要“重建第三国际”，对此究竟应怎么看？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取决于“国际联合”还是靠“成功实证”？

——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国际方位？为什么说它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是扎根中国现实并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为什么它在世界社会主义遭受大挫折时能开创“柳暗花明”的新局面？为什么它在社会主义“消亡论”的叫嚣声中能逆势而上成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

为什么它在世界资本主义日子不好过时却成为东方一道“亮丽的风景”？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的，是我们必须理直气壮地高举的伟大旗帜？为什么说我们今天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在脚踏实地迈向共产主义？如此等等。此文选中有多篇文章从不同角度涉及或参与了这类问题的讨论。读者从中不难了解作者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态度。

总之，作者这些年可以说一直没有离开过“理论前沿”，是从“风口浪尖”上走过来的。20多年前发表过的文章，经过这么多年“大浪淘沙”的洗刷检验，今天居然还能“拿得出手”汇成集子，这是连我自己都不敢想象的，是值得庆幸的。所以说，文选的主体部分起的是“热点回眸探索”的作用。

其次，“回忆和思考”部分，可以起到“揭秘中联部”、认识 and 了解中联部的作用。中联部在1971年公开挂牌之前，它是很神秘的。人们不仅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甚至连名称、地址都是不公开的。它对外叫“复兴大路十八号机关”，你要找这个机关，连警察都未必能找到。媒体公开报道其领导人的活动时，都说是“中共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多年间，中联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它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回忆与思考部分的文章就此作了回答。关心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人们，通常也是关心中联部的工作的。他们从这本文选中可以拨去中联部“神秘”的面纱，深

入了解“中国特色政党外交”是如何形成的，今日的中联部是如何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外交部”的。这一历史性转折的过程，恰恰是作者全程亲身经历过的，留下这些记忆性文字和思考，既是一个“老中联部人”应尽的义务，也是一个研究工作者不可回避的社会责任。

最后，讲一下“附录”。它收录了他人为我的著作所作的序言、题词和评论。这有助于从另一个角度了解我文章的观点，但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些名流大家的高论对整个学术界和广大读者是很有参考和启迪价值的。集子将其作为“附录”奉献给读者，实际可起“借花献佛”作用。譬如龚育之同志在给我《社会主义：转折与创新》一书写的“代序”中，提出“官方研究”（或内部研究）一要有“创造性”，二要“允许不同意见的争论”等意见，具有广泛的现实指导意义，已为全国多家媒体广为转载。高放教授在“序论”中提出，“只有纠‘左’防右，国际共运才能转折创新”的意见，以及他对“共运三个‘七十年’、两次转折创新”所做的学术考察及其真知灼见，都是很有理论和学术价值的。

赵曜教授在《苏联解体我的解读》序言中，肯定“在恩格斯论述的基础上，结合苏联实际，提出要把‘合力论’和‘重点论’相统一，并认为，‘重点论’有两个，一个是党，一个是制度。这个观点是很有见地的”。王长江教授在《对〈苏联解体我的解读〉的解读》的评论中，提出：苏共的失败是党的问题，抑或是制度的问题？他表示“同意把党和制度作为重点。

在这两个重点中，制度有更重的分量，是重点的重点。党的问题也是在制度设计上有问题”。

李君如教授认为，“邓小平说的‘四不’即‘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讲的就是导致‘死路’的‘合力论’。”他还提出，“‘制度’和‘党’是两个关键问题，‘僵化’和‘自由化’都会葬送社会主义、毁灭党。”

刘建飞教授在《解读苏联解体的一个公式》的书评中提出，“作者主张坚持‘合力论’与‘重点论’相统一，外因、内因、远因、近因相结合，紧紧抓住‘党与体制’这个根本点，最后得出‘合力论+重点论=内外远近因+党与体制问题’这个解读公式。用这个公式来解读苏联解体，更让人信服。”

严书翰教授在书评中肯定作者的下述观点，即：“中国30多年来的体制改革，实质上是去‘苏联模式’，增‘中国特色’。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突破和彻底超越了苏联模式，这是中国成功的秘诀。我们既要与西方模式划清界线，也要与苏联模式划清界线，这是搞中国特色的一个基本原则。”但是，他感到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论述还不够，“希望作者在今后此书再版时对此要加以展开和完善”。作者最近发表的《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斯大林模式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方面的不足。总之，著名学者的这些大方向一致，但却不尽相同的具体表述，大大丰富了人们的认识，是很有启迪和深入研究价值的。

关于这个集子，我就讲以上三点。最后我要声明一点，既然这个集子涉及的多是一些热点、焦点、难点问题，就不可能总说得那么正确和准确。因此，我还要强调过去说过的一句老话，即希望大家将这些文章当成“一家之言”，我是“欢迎九十九家批评”的。唯有如此，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发展，我们的认识才能不断有所长进。谢谢各位。

肖 枫

2016 年初春于北京